

中国文化史丛书

振动人世间的翅膀

—中国小说

曲琨



03

-19

沈阳出版社

振动人世间的翅膀

——中国小说

曲 琦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引言	(1)
一、童年艺术	(3)
二、魏晋风度	(13)
三、风流气象	(21)
四、世俗图画	(31)
五、回归现实	(39)
六、末世挽歌	(61)
七、近代新声	(76)

引言

小说写人生写人世便写了历史，写或有写或无便写了追求。追求的翅膀带着人世间的理想，从古振飞到今，便有了中国小说的漫漫长卷。

中国小说的发展相似于其它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有一个逐步从幼稚趋向成熟、由简陋臻于完善的历史过程：萌芽于先秦两汉、雏形于六朝、有意为之于唐、通俗化之于宋元、巨著纷涌于明、顶峰耀耀于清、变革新生于近代。并且，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体裁的作品兴起，其代表型可以简述为：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野乘、六朝的志怪杂录、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上述体裁又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以宋朝为分界线，其前为文言小说的单线发展，其后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互相吸收、互相丰富、双线发展。

追求生存，幻成神话；广传学说，借助寓言；史为君镜，简策兴盛；长生仙梦，记之杂传；鬼神实有，宣于志怪；言行淡雅，集成轶事；文人耀才，露于传奇；市民爽直，情系

话本；今人评史，历史演义；侠胆忠义，聚于《水浒》；游戏密谛，含于《西游》；现实直译，铺叙世情；异类情种，翩游《聊斋》；文人穷途，托于《儒林》；梦醒阵痛，寄于《红楼》；呐喊彷徨，书于谴责。

追求理想千古同，中国小说即是追求的记载。

一、童年艺术

神话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口头创作。其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贫乏，先民们依赖于自然的恩赐繁衍生息，对自然生有真诚的敬畏之心，基于贫乏的生活经验，借以纯朴的主观幻想，创造了神。将风云变幻、生老病死等无法理解的现象，统统归之于神的意志和权力，编出了神话。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化，浮动着历史的影子，主人公是古英雄或具有神性的人物。只是神话在记载之初，多作为具有历史性质的材料而染上历史的色彩，神人相融，神话和传说相杂，故后人并而称之。

中国的神话传说极为丰富，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产生系统性的原著，也没有得以系统性的保存，而是散落在比较晚出的秦汉著作中，如：《左传》、《国语》、《周书》、《楚辞》、《庄子》、《吕氏春秋》、《归藏》、《汲冢琐语》、《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其中以《山海经》为最多。这些存文中的神话，大都经过后人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趋向传说，已非本来面目，但多数还是保存了原作的精华。

神话传说是先民对其生活和历史的富有艺术意味的解释，体现了先民争取生存权力的一切美妙梦想和善良愿望，既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反映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其中，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是神话传说的主要内容。此类神话传说的主人公有着公共的特点：他们不但具有创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非凡能力，还有慈爱的心，更有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一心为人类谋求幸福的精神品质。最普为人知的是创造神盘古和女娲。盘古是“天地万物之祖”，^①，“神于天，圣于地”，“一日九变”，“日长一丈”^②，以巨人的身躯“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③寄托了人类创造自然世界的雄伟志向。女娲既是抟土造人的始祖，更是修补天地、重整乾坤、仁爱至德、挽救世界和人类的再造女神。她在“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颤民，鸷鸟攫老弱”的毁灭性灾难面前，极智极勇，“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④歌颂了女娲的神力和爱心，反映了先民生活在艰险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改造生存环境的美好理想。广为传颂的人物还有治水的鲧和禹、逐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填海的精卫等，在他们身上，集中体

① 任昉《述异记》。

②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③ 清马骕《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记》。

④ 《淮南子·览冥训》。

现了先民敢于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和坚定的信念。反映社会矛盾的神话传说，多是记载部落间的斗争，或争夺地域，或争夺领导权，如：黄帝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舜逐三苗等。是原始社会部落关系的缩影。

神话传说是中国小说的最初渊源。它形象地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生活，塑造了一批寄托先民理想的神和古英雄，这些形象具有心胸博大、深爱民众、勇于牺牲、大公无私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所共赏的民族精神，由神话传说始，这种民族精神至始至终闪现在人们所歌颂的精华人物身上，并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地加以丰富。其次，神话传说于淳厚朴野的叙述中流露出奇伟瑰丽的幻想，寄托着崇高的生活理想，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为后来的小说奠定了优良传统。神话传说的题材，多为后世小说所汲取；神话传说中有一定个性的形象，或直接或间接地活跃在后世的小说里。此外，神话传说开创了神怪体裁，为志怪小说所直接承继。

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的“人为的宗教”，^① 宗教迷信传说应运而生。先秦著作中处处可以见到，如《周易》、《春秋》喜欢言灾言异，而《左传》更是“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② 这是因为先秦承夏、商、周三代宗教盛行之风，极崇巫教，统治者设置专门从事卜筮、星算、祈祷、祭祀、葬礼等活动的巫祝和史官。宗教迷信传说的主要内容有鬼神显灵和作祟、卜筮占梦、阴阳五行、灾异符瑞和命相等。稍后，巫觋和方士之流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② 柳宗元《非（国语）上·卜》。

利用地理博物知识自神其术和传播迷信，造成研究山川物植、远国异民等内容的地理博物学趋于志怪化。前者的代表作是《汲冢琐语》，后者为《山海经》。

《汲冢琐语》，又名《琐语》。晋太康初出自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墓，故称《汲冢琐语》。由于用战国古文字书写，又称《古文琐语》。今所存者较完整的仅十五六则，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① 所涉史实，上起尧舜，下迄战国初。作者可能是三晋的史官，记事以晋国为多。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卜筮、占梦、预测凶吉等，其中占梦故事尤多；二是历史传说，仅存只言片语，来自传说和臆造。明胡应麟对《琐语》的性质作了较确切的评价：“则《琐语》之书，大抵如后世《夷坚》、《齐谐》之类，非杂记商周逸事也。”^② “盖古今纪异之祖。”^③

《山海经》，作者不详。全书由《山经》（即《五藏山经》）和《海经》两部书组成。最早被列入史部地理类，到清《四库全书》始录为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内容颇为杂广，涉及到神话传说、历史、地理、物产、医药、宗教等领域。其中以神话传说最为著名，最为宝贵，以巫书和地理博物书的混合为最多。胡应麟说它“偏好语怪”^④，为“古今语怪之祖。”^⑤《山海经》扩大了语怪的风气，后世仿作和取材于其书的作品很多。《琐语》和《山海经》具备了文言小说的雏形，对志怪

① 《晋书·束晳传》。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

③ 同上，《同上·九流诸论下》。

④ 同上，《同上·三坟补逸下》。

⑤ 同上，《同上·四部正讹下》。

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寓言，亦称寓言故事。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中国“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籍外论之。”

寓言故事盛出于战国。当时，诸侯争霸，高谈雄辩的谋臣策士力为其主而游说各国，陈情说理，需以口舌擅场；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讲学论道，更以言辞成事。他们为了增强论点的说服力，常常运用证理的故事——寓言，因此，先秦寓言多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著作及《战国策》所记纵横家的言辞之中。另外，在《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汉代著作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先秦寓言来源于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文人自编。采用古代神话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采取古代神话材料，略加剪裁，有意识地自觉地发挥神话的想象，借以阐述人们从社会实践中生发出来的认识经验和智慧。如通篇以神话方式构文的《列子·汤问·愚公移山》，写愚公以不懈的精神移山，惊动神并得到神助，移走大山。确立了只要有认真地坚持不懈的精神，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的现实观。二是借用神话夸张和拟人等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寓言故事中的形象和构思故事。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都是以神话方式塑造的寄托理想的形象。采用历史传说的寓言故事，是依据时人看重史实的心理特点，有的直接摘自史书，有的借史实或历史人物敷衍，有的由历史史实生发出去等，这类寓言目的在于从史实中引申出一定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是为了有利于阐述一定的观点，即意在言道，如《韩非子·喻老》中的《纣为象箸》，《庄子·至乐》中

的《鲁侯养鸟》，《韩非子》中的《滥竽充数》、《扁鹊见蔡桓公》等。民间故事是寓言的主要来源，多是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批判和讽刺，如《孟子·滕文公下》中的《攘鸡》，写有一人每天偷邻居家一只鸡，有人劝他，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他说：那就改为每个月偷一只，等明年就不再偷了。单篇看这个故事，就寓有广泛的意义：由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引申为知错即改。因为每天偷一只和每月偷一只，偷窃的性质并没有变。文人自编的寓言，以庄子最为擅长。上述的四种类型很难截然分出，年代的久远等多种原因造成神话、史传、民间传说的流失或更新，使寓言来源的确分已模糊了。

寓言对小说的最大影响在于其所具有的高超的讽刺艺术。先秦寓言的讽刺不仅触及到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世人的思想方法，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寓言所讽刺的主要对象。如：有讽刺违反矛盾律行事的《自相矛盾》（《韩非子·难一》）；有讽刺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者的《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郑人买履》（《同上·外储说左上》）；有讽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有讽刺盲目自大、鼠目寸光的《井蛙与海鳖》（《庄子·秋水篇》）等。讽刺的手法主要为：依据实际的生活逻辑，设置特定的或场景、或情节、或人物、或对话，故事简短却完整，近似白描却更加生动、真切，不着褒贬，而讽刺的味道已浓烈四溢。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历史散文便居正统地位而历代重视，愈记愈详。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对小说影响最大的是：编年体的《春秋左氏传》、国别体

的《战国策》、纪传体的《史记》。历史散文给小说所提供的艺术经验为：人物的刻画、叙述故事的技巧和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

《春秋左氏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史。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9年）。不仅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较为真实、具体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同时连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之事，也予以记载，保存了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宗教活动、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左传》在描写战争方面尤具特色。所记述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鞍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战争。在写叙战争时，十分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经验教训。作者往往把战场的正面描写放在次要的位置，将战争爆发前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放在主写的位置，真实地再现战前的背景、战争的准备、双方的士气、人心的向背、力量的对比以及战后的反应等等，使人悟出战争的胜负并非偶然。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国别体史书，作者不考。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书名原有多种称谓，西汉刘向重新编整时定名。主要记载战国时谋臣策士们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战国策》着重论述人物在政治事件中的言行，写出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邹忌、鲁仲连、张仪、荆轲、

苏秦等。作者不仅善于铺叙环境、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精神面貌，如荆轲刺秦王上路的“易水送别”，气氛慷慨悲壮，衬得荆轲更加刚毅，英雄侠义之气十足。而且善于把繁杂琐碎的事件，处理得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抓住最能表现人物际遇和性格的环节，塑造人物形象，如记晋公子重耳出亡到返回的故事，整个故事跨度长达十几年，表现了平庸稚嫩、贪图安逸的贵族公子，在颠沛流离的逃亡历程中，饱经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成功地建起春秋霸业的政治家。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体例完整的通史。采用纪传体方式写成，开创纪传体通史的先例。作者司马迁。记述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汉太初年间三千余年的历史。《史记》最突出之处在于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主要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历朝历代一系列人物的塑像。作者从人物的一生去完整地叙写，善于选择突出性格的事件，重点地加以描写，这些事件又往往体现为激烈的矛盾冲突。如《项羽本纪》主写巨鹿大战、鸿门宴、垓下突围，是项羽一生的三个重要标志。而其中鸿门宴一场的较量更是胜似战场上刀剑相拼。不仅是项羽，出的人物刘邦、张良、范增、樊哙、项庄等都得到了鲜明的刻划。生动地揭示出项羽坐失良机的前因后果，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性格：豪爽而轻信而少谋。事件和性格互为因果，显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杂史杂传是指正史、编年之外的史书。杂史多记帝王之事，杂传多记诸色人物的生平事迹。杂史杂传的内容多来自传闻，且作者本无意于修史，不重实录而尚新奇，恰如刘勰

所说：“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①所以，杂史杂传常常介于小说和史书之间。

杂史杂传在先秦已产生，以《穆天子传》为代表，初名《周王游行》，西晋初年得之于汲郡汲县的古墓。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游历殊方异国的过程。叙事疏简平质。后人取同出古墓的杂书，有一种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的与《周王游行》合为六卷。《穆天子传》是第一部具有小说意味、篇幅较长的作品，有意识地用神话传说做素材，渲染历史人物。

汉承先秦，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空前发达，其中神仙方术对小说的影响最大。神仙方术的基本观点是：长生不死。在汉代，方士的炼丹术、巫师的符咒和阴阳五行学及老庄哲学融为神仙学，汉末，长期酝酿在巫术、方术、神仙学、阴阳五行学、谶纬学中的道教趋于成熟定型，道书和各种流派的道教纷纷出现。当时，人们真心相信神仙长生的可靠性，热衷之心达于行，也达于言，求仙长生的真梦，载于杂史杂传，形成杂史杂传向志怪小说转化的趋势。主要作品有：《列仙传》、《十洲记》、《洞冥记》、《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神仙传》、《徐偃王志》、《汉武内传》等。主要以西王母、汉武帝、东方朔为中心。以记载汉武帝故事的《汉武故事》为代表作。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前人托为班固所作。今存一卷。记述汉武帝刘彻生于猗兰殿至死后葬于茂陵的杂闻琐事，包括武帝幼年事和即位后内宫后妃的故事、武帝求

① 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史传》。

仙的故事、武帝死后的传说。为人所知的“金屋藏娇”的故事也记于此书。全书以武帝求仙为中心组织材料，聚历史成分与幻想色彩于一体，文笔简洁而又雅致，因此，《汉武故事》一书历代文人征引的很多。

二、魏晋风度

中国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始为雏形，出现了志怪和志人两大流派，志怪一派是直承神话传说和寓言、史传中志怪部分；志人一派是吸取寓言和史传中记载人物言行片断的手法发展而成。

“志怪”二字，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记载怪异故事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孔约、祖台之、曹毗、许氏、于氏、殖氏等人的小说都以“志怪”为书名。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和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式使用“志怪小说”作为小说分类的概念。志怪小说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巫觋方士、道教、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荣，一是由于小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先秦两汉志怪提供了助其兴盛的深厚基础。二是由于社会上道教、佛教的广为传布。汉末道教始创、佛教初传，但到魏晋南北朝时已极为昌炽，影响及于社会各个阶层。佛教尤盛。灵魂不死、轮回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观